

1978年以来，商业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引擎之一，越来越多的商业人物和事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因而值得铭记

喧嚣与轮回

中国商业史记之 X UANXIAO
[1950—2012] X YULUNHUI

【下册】 吴比 郭亮◎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喧嚣与轮回

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

【下册】

吴比 郭亮◎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嚣与轮回: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 下册 / 吴比, 郭亮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13-05259-0

I. ①喧… II. ①吴…②郭… III. ①商业史—中国—1978~ IV. ①F7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1279 号

喧嚣与轮回——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下册

作 者: 吴 比 郭 亮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周为军

责任校对: 杨 帆 张彦能 朱 妍

电脑制版: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2.73 万

插 页: 1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59-0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第六部 草莽争流（1978—1984） // 001

1978 | 荣智健：断裂与传承 // 002

1979 | 霍英东：红顶巨贾 // 014

1980 | 陈春先：中关村商业探路者 // 023

1981 | 年广久：另一种商业符号 // 033

1982 | “八大王” // 043

1983 | 步鑫生：改革明星的悲喜剧 // 059

1984 | 柳传志与张瑞敏：一年两“大佬” // 070

第七部 骤雨将至（1985—1988） // 081

1985 | 艾柯卡：中国商业新偶像 // 082

1986 | 温州人：从地狱到天堂 // 091

1987 | 马胜利：豪迈记忆 // 107

1988 | 海岛不平静 // 115

第八部 启蒙（1989—1992） // 127

1989 | 李东生：轮回的开端 // 128

1990 | 倪润峰：长虹正在升起 // 140

1991 | 仰融：一个商业天才的宿命 // 152

1992 | 袁庚：启蒙者的告别 // 162

第九部 谁主沉浮（1993—1998） // 171

- 1993 | 禹作敏：庄主之劫 // 172
1994 | 史玉柱：奔涌巅峰 // 181
1995 | 周冠五：“厂长”时代终结 // 193
1996 | 金字中：引发中国梦的韩国人 // 202
1997 | 任正非：锋芒毕露 // 210
1998 | “国退民进”的记忆 // 217

第十部 盛世悲欢（1999—2001） // 225

- 1999 | 褚时健：烟王光环褪尽 // 226
2000 | 马云：《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 236
2001 | 龙永图：中国入世，其兴乎焉 // 246

第十一部 失足者的故事（2002—2004） // 257

- 2002 | 顾维军：大限将至 // 258
2003 | 戴国芳：一失足成千古恨 // 266
2004 | 唐万新：绰影红尘 // 277

第十二部 交锋与重生（2005—2012） // 289

- 2005 | 江南春：诗意追梦人 // 290
2006 | 张茵：首富之名 // 299
2007 | 宗庆后与范易谋：正面交锋 // 309
2008 | “朱坚强”：像“猪”一样“苟活” // 319
2009 | 中国：有形之手 // 329
2010—2012 | 别人的铜币 // 336

结语 // 351

后记 涅槃已至 // 353

参考资料 // 357

第六部
草莽争流
(1978—1984)

1978 荣智健：断裂与传承

两年前，“四人帮”被粉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会去向何处？

但凡变革，都需要伟大的思想为人们引路。初夏，《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由此掀开，新鲜空气涌入体制内，商业上有了新变化。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今天熟知的那段评论出自此处：“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政策鼓励，舆论支持，高层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商业复苏虽然一波三折却坚定不移。一场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改革正在悄然推进……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历史没有假设，但假设激发思想。

他出身名门，身份游离于政商之间，虽屡经考验，却总因显赫背景而化险为夷。

1978年，万物更新，更是荣智健的分水岭。伴随时代巨变，他南下香港，开始了新生活，并于厚积薄发中，实现着一个百年家族中兴的梦想。

商业草莽，群雄并起

成就功业，绝非偶然。同样道理，“历史虽为过去时，但它也是现在时、将来时。它由活人创造”。

所谓智者，体现在商业史上，便是那些知进退、明荣辱的先行者。他们既超脱又入世，高调但不张扬，低调而不沉默，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常能规避风险。

1978年前若干年或者数十年的厚积薄发，给了历史新的命题。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不再悬挂于计划体制上，壅塞在意识形态里的水泥开始破裂，朝向世界的窗口被徐徐打开。中国，开始向世界的主流轨道靠拢，希冀以大国的身份重新崛起。

市场大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开始有了新气象，政治与经济开始有了新发展。大部分人犹豫不决，继续观察舆论与政策风向时，有人却大张旗鼓又小心翼翼地当起了小商小贩。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干起了个体工商户，积攒原始资本。

1978年在陈凯旋看来，是一个“垃圾都能卖出价钱”的年代。^①已经在广州打工三年的他正式跳入商海。三年前，普宁流沙公社流管站组织青年外出打工，高中刚毕业的陈凯旋通过熟人介绍争取到一个名额。最初做建筑工人，后拆旧楼，还挖排水工程，陈凯旋做的都是苦力活，只求温饱，不求其他。提起这段经历，陈凯旋感叹：“很苦，但受用无穷。”单干后，他开始做些小规模的投资，只要赚钱，他什么都做，直到接触宝洁，这个早早进入中国的世界标杆企业用眼花缭乱的广告撩动了陈凯旋好奇的神经。他发现，家乡的广大地区物资匮乏，消费需求渐涨。1978年春节，陈凯旋花了3000元买了满满两箱洗衣粉、洗发水回家倒卖。自此，他每周奔波于广州与潮汕地区倒腾商品，跑遍了潮汕地区各大乡镇，逐渐积累起人生的第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① 吴比，《奔腾入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1月。

一笔财富。^①

山西人李海仓^②发现了门道：商店里肥皂紧缺。作为生活必需品，肥皂肯定不愁销路。中秋节前两天，李海仓怀揣着30元路费，背着小包上路了。他的目的地是距家乡59公里的运城。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一个晚上后，他找到运城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恰逢中秋节全厂放假，只剩下守门的大爷。失望的李海仓听说大爷做过肥皂，立刻把刚买的两盒月饼送给了他，还硬拉着他去小店里喝了几杯。几杯下肚，大爷收下了这个“徒弟”。一个星期后，做出第一块肥皂的李海仓返回家乡，找到大队干部，要求大队投资。队里没有资金，只提供给他一些小麦和一口大锅。他卖了小麦，支起大锅，办起肥皂厂。李海仓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上交6000元，第二年上交1万元。肥皂生产出来，供不应求，李海仓把6000元如数交到大队。村子一下子成为令人羡慕的富裕村。

1978年，知青大返城，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于是他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右派”父亲平反，让潘石屹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省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对14岁的小潘来说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一年后，他接到省城兰州一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李途纯再次参加高考，又被录取，当地有关部门还是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第一年，李途纯^③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就因政审不过关，没被录取。历经高考磨难的还有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不得已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被聘为厂会计。

说到鲁冠球，这年他的工厂规模越来越大，有400名工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宁围万向节厂”等牌子，像杂货铺，令旁观者看了心生嫉妒却又暗自佩服。

① 陈凯旋后来创办立白集团，现任该集团董事长。

② 李海仓是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号称民营钢铁大王，2003年遇刺身亡。

③ 李途纯后来创办太子奶集团，后因经营问题引发危机，目前此事尚未尘埃落定。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同年，胡成中^①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推销低压电器。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元钱一夜的通铺上睡一觉。这天，他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唯一的“大人物”

这一年，如同胡成中、鲁冠球一般，多数人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创业之初注定鲜为人知，而之所以被历史提及，缘于日后的辉煌。

1978年，却也注定不只是企业家们发迹的开端之年。这群先知先觉的人物中，或许唯一算得上“大人物”的只有荣智健。日后，荣智健的功成名就为人们津津乐道，也成为官方与民间理直气壮论证改革正确性与必要性的一个有力佐证。

荣毅仁长子荣智健选择南下香江，迈出了延续荣氏家族神话的第一步。尽管他一再声称，“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名望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但是，有父亲这块金字招牌，荣智健注定将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

有人称，荣智健是中国的最后一位贵族。

1942年，荣智健出生于上海。7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资本家从天堂坠入地狱，命运为之改变。而荣家顺应时代，捐出万贯家产，“纺织大王”、“面粉大王”的虚名摇身转化为崇高的政治荣誉。

荣智健则在此庇护下，进入天津大学电机系。

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荣家已不复昔日风光，但“荣公子”的大学生活仍令人艳羡。据他日后回忆，“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②

当时普通学生连馒头都吃不上，荣智健却可以请客吃排骨。

日后荣智健在香港发迹，骨子里的贵族做派死灰复燃，生活之奢侈令人侧目。他不像大多本土富豪那样热衷于豪车，而是像英国老牌绅士，喜欢物色豢养名马。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① 1984年23岁的胡成中与南存辉一起投资生产电器开关，创办求精开关厂。后分道扬镳，胡成中创办德力西集团，南存辉创办正泰集团。

② 《北京现代商报》2005年10月28日文章《荣氏家族百年传奇》。

2000年，他甚至花3亿港元购入一架私人飞机。

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到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基层锻炼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荣氏家族横遭磨难，荣智健也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从未经历的事情，“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①

6年后，30岁的荣智健重回北京，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所。这期间，荣智健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终于有机会静心聆听父亲的经商之道。

香港故事

1978年，荣毅仁得以平反，荣智健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荣家再次有了重现政治与经济荣光的可能。荣智健对科研和政治均不感冒，且很多在外的荣氏子弟都在商界打拼，这让他有了经商的打算。

反观此时内地，荣家资产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所剩无几，荣智健要白手起家并非易事，倒是香港成了最好的选择。在那里，荣氏子弟已经打拼多年。

当年6月，他只身一人，只带着简单行李和一张单程通行证，到了香港。

荣智健变卖了荣毅仁的股份，获得600万港元。这笔资金，成了他与堂兄弟合资成立“爱卡”电子厂的本金。这家工厂主要生产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产品制造完成，再回内地贩卖。

轻工产品恰恰是当时内地最缺乏的商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学习、效仿前苏联，经济建设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日化轻工业相当薄弱，这给起跑期的荣智健们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加入此行的竞争者日益增多，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国人已可以用积压的此类产品换苏联的飞机。

荣智健最初的顺利，正是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轻工业。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获准“内地贩卖”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有了先天的背景优势、后天的现实情况，荣家的电子产品无疑成为时髦品。

不过，电子产品毕竟是“小生意”，他又把目光瞄向了美国市场，在销售了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之后，“爱卡”打出了名头。

成功的商人之所以成功，正在其“激流勇进”的壮举。荣智健看到了危机，他

^①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华人首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认为香港市场资源有限，难以支撑电子产业的发展，遂作出大胆决定——卖掉工厂套现。

最终，美国一家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约持有2/3股份的荣智健独得750万美元，一举成名。

此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托夫勒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第三次浪潮》，以未来学独有的视角，强烈冲击着全世界。

在美国，那时恰是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拔节生长的年代。荣智健再一次找对了地方。

经过运作，他与微软的两位电脑专家——林铭和米歇尔，合伙成立了一家依托电脑多维绘图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荣智健投资120万美元，占有60%的股份。

不久，业内颇有名气的加菲克斯公司收购这家小公司28%的股份。荣智健天马行空的东方式商业头脑此时让他再度作出选择，他想让加菲克斯公司与自己的公司合并上市。

两年后，果不其然，两家公司正式合并，成功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公司股价一路上涨，竟然暴涨40多倍。

也许，在激流勇进之后，就会面临急流勇退，荣智健认为：“美国两年时间，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竞争激烈，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公司，不适合长期经营。”

每每巅峰之际，荣智健便有惊人之举。这次，他出售了全部股份，套现4800万美元，折算3.74亿港元。一进一出，短短数年，荣智健获利40倍。

荣智健以冲刺的速度进行商业运作，却很少失手。他独有的眼光令他总能抢先一步发现市场蓝海。众人痴迷于暴利之际，他又立即舍弃，继续寻找。不断地闯，不断地退，取舍之间寻找均衡点，这是荣智健的独门财技。不过，尽管如此，20多年后的荣智健依然晚节不保……

失望的源头

商人中的高手，不仅要学会自己亲力打江山，还要学会借力打力。1986年，荣氏五代海外亲属200余人与国内亲属20余人在北京聚首，荣智健加盟中信一事开始有了眉目。

不久，此事得到证实。当初由邓小平亲自委托给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终于迎来了荣智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信扮演着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随后，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任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从北京中信得到了人事和经营决策权，中信香港开始了荣智健的时代。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荣智健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是在香港股市“八·七股灾”时。彼时，股价大跌、前途难料，香港各家公司股东心急如焚，公司外迁之风日盛。荣智健捕捉机会，斥资百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20%股份。

此事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但深谙中国政治国情的荣智健却头脑发热，竟犯下低级错误——事前竟未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汇报。事后，尽管荣毅仁好友、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徐昭隆协助其写“陈情表”，可还是有人说“荣氏父子帮助英国人回归前抽走资金”。最终，在邓小平和杨尚昆出面支持之下，总算息事宁人。^①

不管怎样，以香港中信为跳板，荣智健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泰富、恒昌……资本运作手段令人眼花缭乱，此后，中信香港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一个商业“巨无霸”在资本与权力的完美结合下，终于诞生了。

观察者指出，荣智健多方扩展融资渠道，是他在商界运筹帷幄的重要“魔法棒”。

其中，“借壳上市”令其成功收购泰富公司。泰富公司的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毛纺巨头曹光彪拥有实际控制权。当时，曹光彪忙于港龙航空收购战，为补充资金，有意售出泰富。荣智健抓住机会，以旗下一家公司作为收购方出资并购。

几番运筹，泰富发展套上了中信头衔，更名为中信泰富，香港中信也如愿以偿借壳上市。

商海教科书

若说香港中信收购泰富发展是象吞蛇或者象吞象，那么收购恒昌就是蛇吞象。

创立于1946年的恒昌，资格老、信誉高，是华资首席贸易行，资产净值高达83亿港元。这让外来觊觎者难有可乘之机，但荣智健还是找到了“乘虚而入”的机会——郑裕彤家族、恒生银行首任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联合出资收购恒昌，涉及资金56亿港元，遭到恒昌大股东反对。

荣智健趁乱成立一个新财团，股东涉及中信泰富、李嘉诚、郑裕彤家族、郭鹤年、百富勤公司和荣智健本人，几乎囊括了当时香港商界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或企业。财团以每股336港元、总资金69.4亿港元，成功收购恒昌。收购完成后，荣智健通过增发从股市圈来25亿港元，再次收购李嘉诚、郭鹤年等人的恒昌权益，将恒昌

^① 尹峰，《荣氏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完全纳入中信泰富旗下。

从此，荣智健更加“变本加厉”地玩起了走钢丝的资本游戏，而中信香港也跑马圈地，摊子越铺越大，成为威震香港的“紫筹股”。

中信泰富斥资87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12%股权；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合作，以28.5亿港元购买一块商业用地，建120万平方米商业中心；中信泰富以35.5亿港元购得香港兴业国际集团的愉景湾物业发展及有关业务的50%权益……

从房地产、贸易、基建，再到民航、发电，中信泰富不断跨越行业攻城略地，俨然成了一个商业帝国。

荣智健运作的项目大多是顺势而为的结果。他对宏观经济环境、政策解读以及行业前景有着全面、充分且准确的预测和把握。中信泰富收购的资产，即使是价格较低的也都有很好的造血功能和发展前景。

随着香港中信的做大做强，荣智健在其中的股权比重越来越大。其间，中信董事长王军将中信所持3.2亿股泰富股份以低于市价25%的价格出售给后者65位管理层，荣智健一人购入2.91亿股，是为央企MBO之孤例，前无古人。荣智健的财富积累呈几何数增长，使他成为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大财阀之一，连续10年登上胡润富豪排行榜，更在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夺得头筹。《新财富》杂志在《荣智健MBO中国首富模式》一文中这样分析荣智健的财富增长模式：

“中信泰富”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通过配股持有3000万股，10多年来荣智健已经拥有4亿多股，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中信泰富+荣智健”的模式建立了荣个人在“中信泰富”利益分配的清晰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

荣智健以“并购+注资+投资”、“扩股融资+发可换股债融资”模式，通过扩股或发可转债融资完成并购，并向并购项目注资、投资，提升并购项目的赢利能力，在做大“中信泰富”实现国家资产增值的同时，完成了个人财富的增长。

入主中信泰富20年，荣智健手操盘的经典案例之多，足以写就一部波澜壮阔的商海教科书。当然，他也曾遭遇经营危机，不过，中信泰富以及他本人的背景无疑是他纵横商海的两件法宝。

作为身份特殊的人物，荣智健是香港富豪和高官沟通内地的重要“桥梁”。因此，每当经营出现困境，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时，荣智健总是直飞北京，也总会在适当时机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最终渡过难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如此；2008年，次贷风暴也如此。只不过，他撑过了前者，却在后者来临时栽倒了。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2008年10月，“澳元门”事件浮出水面。

中信泰富为了降低西澳洲铁矿项目的货币风险，与汇丰及法国巴黎银行签订了多份“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因澳元大跌亏损逾150亿港元。中信泰富股价持续暴跌，荣智健试图力挽狂澜而赴京求援。在北京长安街建国门东侧的中信大厦，他见到了中信集团主要高层。据当时在场人士说，“（荣智健）丝毫看不出慌乱”。

谢幕？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序曲奏响。

荣智健，头顶红帽的资本家，踌躇满志地离开内地，前赴开放程度更高的香港，寻找更广阔的舞台。30年后的2008年，荣智健依然头顶红帽，却满怀焦虑地离开了香港，赶往聚焦世界越来越多目光的北京，寻找更可靠的帮助。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荣智健的宿命？

然而，这一次荣智健却很失望。他没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一生的声誉和家族的荣耀，甚至不能以“光荣退休”之名结束自己半世纪的商海生涯。“退位让贤”隐含着遗憾与无奈，更悲凉的是，他还必须面对数万名因投资泰富而亏损股民的责任。

荣智健，中国内地“最欧洲化”的富豪，拥有游艇、跑车、房车和高级音响，连飞机和森林都有，以至于有人“痛心疾首”地宣称他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

荣智健并不在乎：“喜欢住舒适房子，喜欢音乐、高级音响、汽车、船、钓鱼，还收集古董和字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对？我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出身！”可如今，这位曾经游刃于实业与资本之间，点石成金的荣氏传人，终于在中信泰富的惊人亏损中黯然离去。

荣氏百年的商界传奇是就此幻灭，还是延续？未来模糊而不确定，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位号称“中国最后贵族”的人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段曾经属于荣智健的光辉记忆会在岁月的尘封下，慢慢褪色……

由荣智健想到李嘉诚

不一样的商业起步，是否真的无法殊途同归？

荣智健与李嘉诚，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生活中的朋友，两人的江湖地位注定彼此间存在着种种交集与相似。只是今天，前者声势渐微，不知能否东山再起；后者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依然如日中天，稳坐华人首富的位置。

荣氏祖上有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中信泰富巨亏后，据一位接近高层的人士透露：“荣其实酷爱投机，只是没有出什么大事，公众毫不知情。”政界人士也如此评价荣智健：“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太子爷，依靠父荫积累财富，当然不像白手兴家的人可以坦然面对媒体的刨根究底。”与“红顶商人”荣智健不同，李嘉诚商海沉浮始终中规中矩地遵从从商之道，面对诱惑时耐得住寂寞。

不管荣智健愿不愿意，他身上的家族光环挥之不去。这种从商基因，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喜欢”走捷径甚至投机。一穷二白中发迹的李嘉诚，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因此他时刻保持谨慎。毕竟无根无底的他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于是，两人的命运，在31年前，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历史的巧合：一个远赴香港，一个则在内地寻找商业的栖息空间。一进一退，勾勒出完全不同的财富轨迹。

荣智健南下香港四个月后，李嘉诚却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细心而刁钻的美国记者发现，李嘉诚身上的蓝色中山装显得有些紧，他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共领导人身边，神情有些局促不安。

天安门广场如此浩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一时有不知所措。自儿时离开内地之后，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国，一回来就站到了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平台上。而在几年前，他在内地媒体口中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资本家，现在却成了贵客。

国庆典礼结束后，回到香港的李嘉诚决定，在家乡广东省潮州市捐建十数座“群众公寓”。他在写给家乡父老的信里表达了对故土的挂念，也一再要求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宣传。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红顶商人”的色彩在这一年显得分外浓烈，当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突然化解了矛盾达成了共识，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将超乎寻常的激荡。

这种激荡伴随着港商过江持续了30年。李嘉诚继续着华人首富的故事，而退出中信的荣智健似乎又从水面沉入水中。

延伸1978：日本经营之神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结束，让这个民族意识到真理的重要性。此前，这是一个漠视真理的国家。从1978年5月开始，国内成功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邓小平在10月出访日本。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这位早年曾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新领袖已经有好久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工厂了。现在，时代已经改变，或者说，他将改变一个时代。

这次行程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走访日本公司。邓小平到了日本后，先去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汽车组配车间里，他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这种情景在20年前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时候也曾出现过。

接着，邓小平来到大阪，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一位神秘的企业家正翘首以待。这位企业家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两个人的会面将松下幸之助的名字带到了日后的中国社会，日本经营之神也成了中国商业复苏之路上第一个偶像级人物。

随行中方记者此后回忆：

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松下电器公司生产各种电视机的概况。从1952年生产第一台电视机以来，截至1978年3月，这家公司已经生产了5000台电视机……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邓副总理应主人的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纪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①

与邓小平的会面让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有了新的想法，来自中国的铁腕人物邓小平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从容和淡定，以及对电子产品的兴致盎然都令松下幸之助怦然心动。他知道，巨大的中国正在掉转船头，而松下很可能成为中国复苏的一个伙伴。

这促使他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新战略——进入中国市场。

其后的两年间，松下幸之助先后两次飞过日本海，来到中国。松下公司对华投资也陆续展开，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技术与设备，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过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务所也随之开设。

松下幸之助本人的商业理念、用人之道更是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商人顶礼膜拜的模板。而松下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引来了一大批其他日本企业巨头。在其

^①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